

# 唐传奇名实辨

郝 敬

**内容提要** 魏晋杂传作品中的诗传类作品，是唐传奇产生的直接文体渊源，但唐人并未对本时代盛行的这一类作品进行理论层面的研究。宋人首先对唐传奇作品中蕴含的“史才、诗笔、议论”等典型特征作出理论考察，并通过对“传”体文的文体认知，确定了这类作品的性质归属。同时，随着宋人小说观念的拓展，传奇作品也渐渐被忽略了原有的典型特征，从史部杂传类归入了子部小说类的范畴。

今人治小说者大多将唐传奇放在唐代小说的范畴里论述，这里面本有先天的概念缺陷，即在唐人小说观念中，传奇这种文学表达形式，还未进入唐人的小说范畴，也即没有进入唐人的理论观照领域，因此在严格意义上也就不能成为唐代小说的代表，只能作为唐代某一时期的流行文学表现形式。如果以今人之小说观念与标准来划分，则大抵可以从创作的层面，如以叙事、审美等题材类型的角度加以断代研究。立足中国小说的宏观发展考虑，传奇作为一种文体，从创作的出现到该种表达形式的被认可，及开始相关理论研究，时间跨度较长，在创作兴盛的唐代当时并没有出现专门的理论研究，而到了宋代才出现有针对性的讨论，现在我们对唐传奇的理解，大多基于宋人的认知观念，所以在唐传奇最初的理论构建中、在小说发展中的所处位置及作用，事实上反映的应该是宋人观念影响下的产物。唐传奇作品的产生及特征，论者多矣，此不赘述。本文将通过对唐传奇作为文体的形成及其称谓的最终确定等相关问题的梳理，讨论唐传奇作品的最终定型。这种定型在理论研究的层面上，主要表现为“传奇”这个称谓由某一部作品的专有名称逐渐演变为这一类作品的通用名称。

—

最早对唐代传奇作品作出理论考察的是南宋时期的赵彦卫。他在《云麓漫钞》中对唐传奇的

产生背景作出这样的评述：

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贄，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sup>①</sup>

这一段评述不仅概括了传奇类文体所具有的“史才、诗笔、议论”等表现特征，还指出了传奇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即行卷。鲁迅曾在此观点基础上，作出了一个直观的判断。其云：

此类文字，当时或为丛集，或为单篇，大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时亦近于俳谐，故论者每訾其卑下，贬之曰“传奇”，以别于韩柳辈之高文。顾世间则甚风行，文人往往有作，投谒时或用之行卷，今颇有留存于《太平广记》中者（他书所收，时代及撰人多错误不足据），实唐代特绝之作也。<sup>②</sup>

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三讲中，鲁迅又叙述了行卷对传奇创作的影响，其云：

唐至开元天宝以后，（传奇）作者蔚起，和以前大不同了。从前看不起小说的，此时也来作小说了，这是和当时底环境有关系的，因为唐时考试的时候，甚重所谓“行卷”；就是举子初到京，先把自己得意的诗钞成卷子，拿去拜谒当时的名人，若得称赞，则“声价十倍”，后来便有及第的希望，所以行卷在当时看得很重要。到开元天宝以后，渐渐对于

诗,有些厌气了,于是就有人把小说也放在行卷里去,而且竟也可以得名。所以从前不满意小说的,到此时也多做起小说来,因之传奇小说,就盛极一时了。<sup>③</sup>

鲁迅并未就行卷影响传奇创作展开详细讨论,只是下了一个断语。程千帆先生曾著有《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其中第八章《行卷风尚的盛行与唐代传奇小说的勃兴》,详细论证了传奇的产生背景与行卷这种社会现象的关系,可参。<sup>④</sup>

考察唐代传奇类作品,我们发现,虽然在唐代中期的贞元(公元785—805年)、元和(公元806—820年)年间出现了极为成熟的传奇名篇,但用传奇作品行卷的风气,此后遭到一定程度的打击。北宋时期的钱易在《南部新书》中记载:

李景让典贡年,有李复言者,纳省卷,有《纂异》一部十卷。榜出曰:“事非经济,动涉虚妄,其所纳仰贡院驱使官却还。”复言因此罢举。<sup>⑤</sup>

这对作为传奇重要表现作用的行卷实用功能,不啻为根本的否定。但行卷的风气还有一丝尚存,如南宋时期的陈鹄在《西塘集耆旧续闻》中记载:

后唐明宗公卿大僚,皆唐室旧儒。其时进士贽见前辈,各以所业,止投一卷至两卷,但于诗赋歌篇古调之中,取其最精者投之。行两卷,号曰“双行”,谓之多矣……<sup>⑥</sup>

可见,直到北宋初期,行卷的风气尚存,只是行卷的内容已经不再包括传奇,仅以诗赋为主。

唐代传奇作品蕴含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区别于同期其他作品的三个典型特征。唐代文人的追求目标与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莫过于修国史。刘餗在《隋唐嘉话》中记载:“薛中书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使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sup>⑦</sup>而为进士登第努力的文人,往往通过撰写具有“史才、诗笔、议论”特点的作品来展现自己兼备修国史的才能。这种集体的行为也是有着长期的历史传统。例如,《晋书·职官志》记载:“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郎,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sup>⑧</sup>杂传体的作品,往往长于叙事,尤其是纪一人一事之本末,因此成为行卷中最为突出的实际功能。诗歌是唐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何况诗

赋取士的考试制度,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文人的诗歌创作。在行卷的文章中,如何展现自己包括诗赋创作等多方面的文采、驾驭文史的能力,杂传体的表现形式就为这些准进士们提供了一个十分有用的表现媒介。早在杂传作品产生的初期,如魏晋杂传中就出现如《杜兰香传》《桃花源记》这样的诗传类杂传,更为贴近唐代传奇作品的文体渊源。该类作品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即在文章中含有相对独立的诗歌,对文章起到总领本事或抒发议论的作用。这与唐代传奇作品中多有诗歌唱咏、辞赋对答的结构处理颇为相像。议论是唐代传奇作品最为突出的特点,许多优秀的篇章往往借文中人物阐发了重要的论断。如元稹《莺莺传》在传文结束时,借张生之口对“张志亦绝矣”的原因发议论云: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僂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sup>⑨</sup>

通过这个辩白,使得“于时坐者皆为深叹”,达到了“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的社会效果。当然,这个议论是否有利于对元稹本人的道德评判,不在本文考察的范围,但是这种观点的发出表明了传奇的议论功用。也有的作品直接表达了作者个人的判断,如李公佐《谢小娥传》篇末议论云:“余备详前事,发明隐文,暗与冥会,符于人心。知善不录,非《春秋》之义也。故作传以旌美之。”<sup>⑩</sup>

不仅如此,更有以作者群体发出的论断,如陈鸿《长恨歌传》在传文结束时,发出了这样的议论: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sup>⑪</sup>

这种议论往往给传奇作者营造了一种被人了解的更为直接的途径,得以赢取较高的声誉,而这种议论往往也是被时人所接受,成为传奇创作的必备因素。李肇《国史补》卷下云:“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sup>⑧</sup>如果已经有了良史之才的美誉,则修国史也名正言顺了。

对于唐传奇“史才、诗笔、议论”特征的理解,学界往往较易忽视其文体上的一些渊源特征,正如上文所提魏晋时期的诗传体裁的杂传作品,这里需要特别说明。这一类作品往往以传文的形式伴随着诗歌附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诗歌创作的本事理解,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曹毗的《杜兰香传》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这两部作品在史志书目中都没有单独著录。《杜兰香传》的部分文字甚至曾被误收入明人辑录的干宝《搜神记》中,<sup>⑨</sup>李剑国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考证,可参。<sup>⑩</sup>《桃花源记》的研究则相对明晰,这里不再赘述。《晋书·文苑传》云:“时桂阳张硕为神女杜兰香所降,毗因以二篇诗嘲之,并续《兰香歌诗》十篇,甚有文彩。”<sup>⑪</sup>这十篇诗歌,久已亡佚,但我们可以依据《晋书》的这段记载,确认《杜兰香传》的创作是有本而写,和陶渊明《桃花源诗》并《桃花源记》的创作情况颇为相似,皆是前部为传记,后部为诗赋。《桃花源记》全文329字,《杜兰香传》现存佚文,据李剑国辑录已达609字,则全文字数不会少于此篇幅。两篇传文,基本都是依据诗歌所记而详加阐发,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是对诗歌所赋之事的本事解读,而诗歌本身即带着使读者阅读产生怪异之感的特征,则传文不可避免更加着重于对于奇异之事的叙事刻画。这种情况,与魏晋以来大量的杂传类作品出现有一定联系,但又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即有诗赋之总领与一人一事之记叙,而大多数杂传作品则无此特点。

学界现已将杂传作为唐传奇的文体渊源之一来考察,<sup>⑫</sup>逐渐更正了自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作出“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sup>⑬</sup>的误判。对此笔者在这里提出补充讨论,即人物杂传虽在诸多方面与唐传奇发生联系,但有两个地方还不足以形成必然对应的发展关系。其一,人物杂传虽叙一人之始末,但往往传一人以多事,才能反映传

主生平,与唐传奇详叙一人一事,只体现传主某一阶段之事由本末,尚有较大差异。而诗传类的作品就较好的弥合了这个差异性,以一人一事详叙始末,篇幅相当,是为杂传大类中与唐传奇作品最为贴近的渊源之一。这个特征远比鲁迅从“想像和描写”的行文技巧的角度出发,得出“阮籍的《大人先生传》、陶潜的《桃花源记》,其实倒和后来的唐代传奇文相近,就是嵇康的《圣贤高士传赞》、葛洪的《神仙传》,也可以看作唐人传奇文的祖师的”<sup>⑭</sup>观点要更有力。其二,诗传类的作品既有史传的成份,又有诗歌的总领,这与唐传奇“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sup>⑮</sup>的特征俨然相同。如《杜兰香传》正文亦多见史才、诗笔之运用,《桃花源诗》则多加议论。这就比大范围的人物杂传,于唐传奇的产生更有明确的渊源指向。可以说,魏晋时期的诗传作品,已经开启了唐传奇文体形成的序幕。

## 二

如果说行卷等社会行为给唐代传奇作品的创作提供了一片有益的生长土壤,那么,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则为传奇作品进入学者理论观察与思考的领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唐代虽有传奇作品出现,但没有这一类文体的专有称谓形成。最早出现用“传奇”这个名称来指代该类作品,已经是北宋时期,并且这个称谓与“小说”语词形成的最初状态相似,与我们观念中的唐代传奇作品,有着一定的差异。毕中询《幙府燕闲录》云:“范文正公作《岳阳楼记》,为世所贵,尹师鲁读之曰:‘此传奇体也。’”<sup>⑯</sup>同样是古文家的尹洙,从文章学的角度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作为传奇体的写作方式来看待。当然,《幙府燕闲录》中的记录过于简洁,我们无法了解尹师鲁所谓的“传奇体”究竟为何。对这段本事记载更为详细的是陈师道的《后山诗话》。其云:

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尔。”《传奇》,唐裴铏所著小说也。<sup>⑰</sup>

将尹洙及时人眼中的“传奇体”特征,定义为“用对语说时景”,并且特别举例指出具有这种特征的标志性作品是裴铏的《传奇》。《传奇》,《新

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裴铏《传奇》三卷。”<sup>②</sup>但裴铏生平事迹不见史志记载。目前最早可见的是宋人计有功在《唐诗纪事》<sup>③</sup>中的记载。

在晁公武看来，《传奇》之于高骈的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其云：“《唐志》称高骈客，故其书所记皆神仙恢谲事。骈之惑吕用之，未必非铏辈导谏所致。”<sup>④</sup>晁公武之论，周楞伽辑注《裴铏传奇》已有反驳，可参。<sup>⑤</sup>故裴铏《传奇》曾被宋人作为传奇体文学形式的代表。从现存《传奇》文字来看，最明显的特征莫过于大量使用对话，而范仲淹《岳阳楼记》遭到尹洙的贬低性解读，正因为有着与其相似的特征。

被宋人称为“传奇”的另外一部作品是元稹的《莺莺传》。《莺莺传》全文载《太平广记》，<sup>⑥</sup>《类说》本《异闻集》此篇题为“《传奇》”，<sup>⑦</sup>但《类说》本《异闻集》中各条目名称不一定作本来名称，时有改动，如《柳氏传》题为《柳氏述》。赵令畤在《辨传奇莺莺事》文中，直接将元稹所作的这段故事称为“传奇”，其文援引王性之《传奇辨正》，亦使用“传奇”作为篇目名称。其云：“……则所谓《传奇》者，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sup>⑧</sup>王性之即王铎，著有《默记》。而赵令畤在《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中说：

夫传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以不载于本集而出于小说，或疑其非是。今观其词，自非大手笔孰能与于此。<sup>⑨</sup>

则确指《莺莺传》，并且已经将元稹的《莺莺传》，也就是《传奇》，纳入了宋人小说观念的范畴中。这种认知的变化，我们可以认为是受到宋人在《崇文总目》与《新唐书·艺文志》中对唐人小说观念作出革新后的影响。下文还有讨论，这里先暂时跳过不谈。而南宋时期，《莺莺传》的称谓被《传奇》取代，已经十分普遍。例如，傅幹《注坡词》中，[定风波]（莫怪鸳鸯绣带长）“为郎憔悴却羞郎”句下，傅幹注曰：

《传奇》：“崔氏与张籍诗：‘自从别后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sup>⑩</sup>

又，[浣溪沙]（桃李溪边）“香在衣裳妆在臂”句下，傅幹注曰：

《传奇》：“张生与崔氏谐遇，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不为从人间至矣。有顷，

寺钟鸣，红娘促起，崔氏娇啼宛转，红娘拥之而去。张生辨色而兴，自疑于心曰：‘岂其梦邪，所可明者，妆在臂，香在衣，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茵席而已。’”<sup>⑪</sup>

明确将《传奇》作为《莺莺传》的正式称谓。

此外，伴随着小说的内容取材进入民间曲艺表达形式的领域，传奇类的题材也进入了艺人选择的范畴。因戏曲说唱表演范畴下如诸宫调中的传奇与我们讨论的传奇性质并不相同，只不过假用其名，这里我们仅就与小说内容关系密切的说话形式下的“传奇”稍作阐述。南宋中期的灌圃耐得翁《都城记胜》记载：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sup>⑫</sup>

传奇俨然成为小说的主要表演类型，成为与烟粉、灵怪并列的流行题材。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局限在宋室的疆域，在游牧民族统治的中原及北方，传奇作为小说的表现类型之一，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同。《金史·佖幸列传》云：“张仲轸幼名牛儿，市井无赖，说传奇小说，杂以俳优诙谐语为业。”<sup>⑬</sup>传奇进入小说观念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接受。至于将传奇作为说话表现类型之一的小说，我们可以借助南宋后期罗烨的记载，了解其代表篇目。罗烨在《小说开辟》一文中，例举了当时说话伎艺中的一些代表性传奇篇目，其云：

论《莺莺传》《爱爱词》《张康题壁》《钱榆骂海》《鸳鸯灯》《夜游湖》《紫香囊》《徐都尉》《惠娘傀儡》《王魁负心》《桃叶渡》《牡丹记》《花萼楼》《章台柳》《卓文君》《李亚仙》《崔护觅水》《唐辅采莲》，此乃为之传奇。<sup>⑭</sup>

可见，宋人对传奇的理解，经过了对裴铏《传奇》、元稹《莺莺传》等作品的具体特指，发展到后期对这一类作品的泛称。

回到前文尹师鲁对范仲淹《岳阳楼记》的评论。尹师鲁出于对“用对话说时景”的行文特征的轻视，以及对“传奇体”写作方式能否进入古文创作领域的潜在怀疑，所以产生了否定的解读。

其实对传奇体作品的轻蔑,来自于正统文章学家的固有传统。早在唐代中期以后,作为古文大家的韩愈与柳宗元,写成了一系列类似于史部纪传体表现特征的文章,其中的名篇如韩愈的《毛颖传》、柳宗元的《河间妇传》《段太尉佚事状》《童区寄传》《种树郭橐驼传》等。与正史的列传书写模式稍有区别,对古文创作表现出一定的革新之举。这些文章往往遭到保守古文家的抨击。张籍曾写信给韩愈,表达了他的反对态度,其云:“……比见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以累于令德。”<sup>⑧</sup>韩愈对此作出回应,其云:“吾子又讥吾与人为无实驳杂之说,此吾所以为戏耳。比之酒色,不有间乎?吾子讥之,似同浴而讥裸裎也。”<sup>⑨</sup>但是张籍依然坚持自己对古文的判断,其云:

君子发言举足,不远于理;未尝闻以驳杂无实之说为戏也。执事每见其说,亦拊拊呼笑,是挠气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为中不失正,将以苟悦于众,是戏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义之道也。<sup>⑩</sup>

韩愈于是不再如前次回避就虚的态度,而是对自己的创作方式引经据典,找出合理依据反驳对其的质问,其云:

驳杂之讥,前书尽之,吾子前复之。昔者夫子犹有所戏,《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记》曰:“张而不弛,文王不为也。”恶害于为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也!<sup>⑪</sup>

这一段交锋,五代时期王定保所撰《唐摭言》中有记载,其云:“韩文公著《毛颖传》,好博籀之戏。张水部以书劝之,凡三书。”<sup>⑫</sup>柳宗元表达了对韩愈观点的认同与支持,其云:“韩子穷古书,好斯文,嘉颖之能尽其意,故奋而为之传,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之励,其有益于世欤!是其言也,固与异世者语,而贪常嗜琐者,犹咕咕然动其喙。”<sup>⑬</sup>针对一些对《毛颖传》的非议,还特别申明自己为之辩白:“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sup>⑭</sup>

那么,从唐代到宋代,文章学领域中的古文家一派,对《毛颖传》一类的传奇体单篇文章或已经结集的如裴铏《传奇》等小说的表述形式,是否可以纳入古文创作的体系,大多观点不一,

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在《传奇》条下引陈师道《后山诗话》,云:“尹师鲁初见范文正为《岳阳楼记》曰:‘传奇体耳。’然文体随时,要之理胜为贵,文正岂可与传奇同日语哉?盖一时戏笑之谈耳。”<sup>⑮</sup>采取了一种调和的态度,以“理胜”为宗旨,事实上承认了传奇的表现手法在古文创作中的位置。刘开荣先生《唐代小说研究》,在第一章《传奇小说勃兴三大要素——古文运动、科举制度及佛教影响》作出相关讨论,亦可参。<sup>⑯</sup>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认为唐代的行卷行为在客观上刺激了传奇作品品质的成熟与量的激增,而唐代中期及北宋以来的古文运动,对古文家借鉴传奇作品中创作手法的探讨,又为传奇的最终定性奠定了理论基础。所以宋代以后,人们对传奇的典型特征及性质功用等有了相当的理论总结。南宋的洪迈曾经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sup>⑰</sup>元代的虞集在《写韵轩记》中说:“盖唐之才人,于经艺道学有见者少,徒知好为文辞。闲暇无所用心,辄想像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为诗章答问之意,傅会以为说。盖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娱玩。非必真有是事,谓之传奇。元稹、白居易犹或为之,而况他乎!”<sup>⑱</sup>更加突出了对传奇作品文学特征的把握。而稍后的夏庭芝在《青楼集志》中云:“唐时有‘传奇’,皆文人所编,犹野史也,但资谐笑耳。”<sup>⑲</sup>则完全将关注点集中在作品最终指向的趣味性,忽略了宋人总结的“史才、诗笔、议论”等典型特征。

### 三

前文在讨论魏晋杂传时,已经提及杂传体是唐代传奇作品产生的文体渊源。学界对此已经有了较为准确的认知,逐渐更正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志怪”说的误判。那么,唐代传奇对杂传的继承情况,是如何进入宋人研究领域的呢?

五代后晋时期的刘昫编撰《旧唐书》,其《经籍志》著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sup>⑳</sup>于杂传类和小说家类并未收载传奇作品。赵宋建国后,太宗皇帝勅令撰《太平广记》,于太平兴国三年八月(公元978年)撰成。其书在第484—492卷收录了《李娃传》《东城老父传》《柳氏传》《长恨传》

《无双传》《霍小玉传》《莺莺传》《周秦行记》《冥音录》《东阳夜怪录》《谢小娥传》、《杨媚传》、《非烟传》和《灵应传》等14篇传奇作品，并将这些作品单独归属于单独一个类别，命名为“杂传记”。此为宋人对传奇作品作出的首次性质划分与类别归属，可以认为宋人此时已经对传奇与杂传的关系有了一个基本的判别。但是，《太平广记》撰成后，虽于“太平兴国六年正月奉圣旨雕印板”，<sup>④</sup>但“言者以为非学者所急，收墨板藏太清楼”，<sup>⑤</sup>所以未能广泛流传。故《太平广记》对传奇性质归属上的最初理论判断是否能完全代表此时的群体观念认知，还不足以据。因此我们还需借助于其他文献典籍的理论阐述，考察这种观念是否被最广泛的接受。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文苑英华》基本修成。在《文苑英华》第792—796卷收录了被命名为“传”的一类作品，<sup>⑥</sup>其中包括了一般概念下的传体文以及前文提到的韩愈、柳宗元所创作的一些引起争议的作品，如《毛颖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此外，这一类也收入了如陈鸿《长恨歌传》、沈亚之《冯燕传》等传奇作品。可见，《文苑英华》与《太平广记》对传奇作品的性质判别基本相近，都归属于“杂传记”或“传”的大类。

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反映北宋皇家藏书情况的《崇文总目》修成。《崇文总目》在传记类著录了如《虬髯客传》、《李靖行状》这样的传奇作品，又在小说类著录了同性质的《补江总白猿传》与裴铏的《传奇》，体现出对这一类作品性质的把握与分类还未最终确定。但我们也看出，这样看似混乱的分类，其实也反映出在宋人的观念中，传奇由杂传或传记的性质渐次融入了小说的范畴。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新唐书》全书完成，其杂传记类已不再著录传奇作品，而全部归类于小说家类，如其小说家类著录了传奇集裴铏《传奇》和单篇传奇作品《补江总白猿传》，显示出对《崇文总目》修成以来的传奇性质判别与小说观念发展。南宋后期的谢采伯在《密斋笔记》的序文中说：“要之，无牴牾于圣人，不犹愈于稗官小说、传奇志怪之流乎？”<sup>⑦</sup>所持的就是已经发展后的小说观念。与此同时，志怪类题材的作品也基本完成了从史部杂传类向子部小说类的完全退入。

宋人对唐代传奇作品的特征把握和性质归属，经过了上述的一个由“杂传记”或“杂传”组成的“传”体大类向小说类演变的过程，而以“传”的表现形式成为宋人对传奇作品最重要的文体认知。在传奇的特征被固定解读后，唐代形成的“史才、诗笔、议论”典型特征在宋代传奇作品中逐渐消退，终于成为小说范畴里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既然传奇作品多以“某某传”为名，且多归属于“杂传记”、“杂传”等“传”体系列的类别，我们就不得不对“传奇（chuán qí）”现在的读法产生疑问。清人梁绍壬在《两般秋雨盦随笔》中说：“《传奇》者，裴铏著小说多奇异，可以传示，故号‘传奇’。”<sup>⑧</sup>从内容题材的角度加以阐释，认为用传播的目的来命名，这似乎成为现在对传奇（chuán qí）二字读法的由来。但梁绍壬将裴铏《传奇》作为小说，显然以宋代之后小说观念诠释唐代作品，故解读唐人本意并不稳妥。笔者以为从以上的讨论看，读如“传奇（zhuàn qí）”更为合理，更能体现此类作品的文体渊源与最初人们对其的特征认知。特提此一说，以备继续讨论。

[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古体小说观念流变研究”及安徽大学博士科研启动经费项目（02303319）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④（宋）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卷八，第135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

②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第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③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三讲，载《鲁迅全集》，第9卷，第3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第79—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⑤（宋）钱易撰，黄寿成点校：《南部新书》，卷甲，第9页，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⑥（宋）陈鹄撰，郑世刚点校：《西塘集耄旧续闻》，卷八，第64—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⑦（唐）刘素撰，程毅中点校：《隋唐嘉话》，第28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⑧⑩（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二十四，第735页，卷九十二，第2386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⑨（唐）元稹：《莺莺传》，引自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第1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⑩（唐）李公佐：《谢小娥传》，引自《唐人小说》，第95页。

- ⑪(唐)陈鸿:《长恨歌传》,引自《唐人小说》,第119页。
- ⑫(唐)李肇:《唐国史补》(原古典文学版),第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 ⑬(晋)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卷一,第15—1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 ⑭李剑国:《〈神女传〉、〈杜兰香传〉、〈曹著传〉考论》,《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4期。又,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第613—614页对此亦有讨论,可参。
- ⑮孙逊、潘建国:《唐传奇文体考辨》,《文学遗产》1999年第6期。
- ⑯鲁迅:《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载《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第6卷,第321页。
- ⑰(宋)毕中询:《幙府燕闲录》,引自(明)陶宗仪:《说郛》,第3册,卷十四,第237页,中国书店1986年版。
- ⑱(宋)陈师道:《后山诗话》,引自(清)何文煊:《历代诗话》,第310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 ⑲(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十九,第1543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 ⑳参见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七,第10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 ㉑(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十三,第5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 ㉒(宋)裴铏著,周楞伽辑注:《裴铏传奇》,前言,第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 ㉓(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四百四十八,第4012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 ㉔(唐)陈翰:《异闻集》,引自(宋)曾慥:《类说》,卷二十八,第473页,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 ㉕㉖(宋)赵令畤撰,孔凡礼点校:《侯鯖录》,卷五,第126页,第135页,中华书局2002年版。
- ㉗㉘(宋)傅幹:《宋傅幹注坡词》,卷四,卷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是书选用黄永年所藏徐积余本影印,徐本为沈德寿《抱经楼藏书志》所录天一阁本的钞本。
- ㉙(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引自《东京梦华录(外四种)》,第98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 ㉚(元)脱脱等:《金史》,卷一百二十九,第2780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 ㉛(宋)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一,第4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 ㉜(唐)张籍:《籍遗愈书》,引自(唐)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二,第1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 ㉝(唐)韩愈:《答张籍书》,《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二,第132—133页。
- ㉞(唐)张籍:《籍遗愈第二书》,《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二,第134页。
- ㉟(唐)韩愈:《重答张籍书》,《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二,第136页。
- ㊱(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丛书集成初编),卷五,第45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是书选用学津讨原本排印。另,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唐摭言》作“凡二书”(第55页)。
- ㊲(唐)柳宗元:《答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引自(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二十一,第570—57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 ㊳(唐)柳宗元:《与杨海之书》,《柳宗元集》,卷三十三,第848页。
- ㊴(宋)陈振孙著,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第3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 ㊵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 ㊶洪迈此语,不见今本《容斋随笔》,疑有佚文。今引自清人陈莲塘《唐人说荟》例言,扫叶山房宣统三年石印本。另,桃源居士在《五朝小说》中的《唐人小说序》文中,亦记有此语。
- ㊷(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十八,第645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 ㊸(元)夏庭芝著,孙崇涛、徐宏图校注:《青楼集校注》,第43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按,此序文仅见明人无名氏所辑《说集》本,陶宗仪辑、明人陶珽重校《说郛》本、明人陆楫所辑《古今说海》本、叶德辉辑《双梅景闇丛书》本皆不见收录。
- ㊹(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四十六,第1963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 ㊺李昉:《太平广记表》,引自《太平广记》,第1页。
- ㊻(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四,第1031页,上海书店1987年版。
- ㊼(宋)李昉等:《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66年版。
- ㊽(宋)谢采伯:《密斋笔记》(丛书集成本),第1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 ㊾(清)梁绍壬撰,庄蕙点校:《两般秋雨盦随笔》,卷一,第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王秀臣